

茶座

总第十二辑 2008 第二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虞云国:宋代刺青琐谈

聂作平:靖康耻:北宋帝国覆亡之际的几副嘴脸(下)

萨 苏: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上)

施爱东:骊靛传说:竞择生存的历史叙事

蔡登山:胡适也喜欢陆小曼吗?——兼谈沪上两大名媛

陆 远:惠此齐东与人分南北

——“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一)

魏邦良: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彭 勇:顾诚先生



山东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学术成果出版项目

ISBN 7-301-06000-0 定价：35.00元

历史学家茶座

第12辑 历史学名家茶座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本辑邀请了多位知名历史学家，就当前历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历史学名家茶座》系列丛书，旨在为历史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II | **历史学家茶座12**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2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9-04473-8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612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项目负责 王海涛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张智慧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01

E-mail: lishixuejiachazuo@126.com

zhangzhahui81@163.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历史的“用途”

马俊亚

有位理工科的学者问我：“历史有什么用途呢？就那么点东西，你这样说，他那样说。如何判定谁对谁错？”

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遇到。经过探究，我终于明白，在问者的眼里，历史“那点东西”充其量是书本上所记载的那些内容。这实在是误解。至少在我看来，历史的范畴要广泛得多。就像上述问题本身已成为历史那样，宇宙万物，什么都注定成为历史。历史学家所鼓捣的“那点东西”，也绝非仅仅是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而是包罗万象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生活都是历史。

一个国家的立国原则和依据，一个民族的辉煌与自信，一个人物的地位和名望……基本都依赖历史的元素。而上述的一切，若没有历史来证明，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需要，才为伪历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历史是可以判定对错的。

曾有西方学者力主中国人种系从西方传入；也曾有中国某位“伟人”更改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而现在，更有东方某国的“学者”把中国从未出过国门的孔子、西施、李时珍等统统变更了国籍，说成是他们的同胞。因此，判定历史的对与错，并不是玄而又玄的事；只要具备基本的理性和道德，许多历史难题很容易迎刃而解。反过来，弄清历史的对与错，对于消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全民癫狂或集体性的歇斯底里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历史独特的“用途”，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目录



003 马俊亚 历史的“用途”



007 魏万磊 晚年梁启超

013 散 木 南桂馨与刘师培以及刘氏著作的整理和出版

027 陆 远 惠此齐东与人分南北——“八马同槽”与 20 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一)

034 王 和 学者眼中的黎澍先生

041 魏邦良 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051 彭 勇 顾诚先生



059 赵 刚 宰相的“模棱”

068 李 强 不该被历史遗忘的宋仁宗

074 聂作平 靖康耻:北宋帝国覆亡之际的几副嘴脸(下)

084 郭梓林 嘉靖继统

091 蔡登山 胡适也喜欢陆小曼吗?——兼谈沪上两大名媛

掌故钩沉

- 097 孙言诚 读史辨误五则
- 103 虞云国 宋代刺青琐谈
- 111 睦达明 可笑、尴尬、郁闷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二

公私档案

- 119 萨 苏 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上)
- 130 黄力民 不一样的远东战役
- 135 蔡振翔 陈寅恪致中华书局信札跋

九州风土

- 138 罗 新 横绝大漠心飞扬——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

旧案重审

- 145 王守中 慈禧评价之我见
- 154 施爱东 骊轩传说:竞择生存的历史叙事



晚年梁启超 魏万磊*

罗伯特·J. 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曾在他的作品《虽死犹生:广岛的幸存者》中用“幸存者”(survivor)概念来阐发人的政治心理,认为早年经历过与亲友和同志生离死别,自己却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通常会产生这种心理。“幸存者”的生存勇气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亲友和同志的歉疚,二是对于“不朽”的追求。后来利夫顿又用这种“牺牲政治学”解释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论”的心理基础,获得很大成功(罗伯特·J. 利夫顿《“道”之永生》)。人对死亡的焦虑与对长生的渴望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对梁启超晚年生活片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也有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情结,但不同的是,他不是希望通过不断“革命”达到“道”(真理)之永生,而是将不朽与“立言”、“立德”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梁启超晚年有浓厚的“流亡者情结”,因为长期的流浪生活与他变动不居的个人性格都将影响后人对他自己的评价,所以他对于寿终正寝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并希望后人给予他稳定如一的评价。

梁启超25岁之前比较顺利,此后便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甚至是极度危险的生活,到了50岁时,他已明显表露出了“老有所依”的渴望。1922年11月21日晚上,陈伯严邀请梁启超吃饭,拿出来50年的陈年老酒,梁启超就多喝了几杯。第二天清晨6点半他坐车去听欧阳竟无的佛学讲座,结果感染风寒,回家后大吐,睡了

* 魏万磊,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半天。张君勱得知后万分关切,约请第一医院院长为他检查身体,但梁启超晚上在法政学院有两个小时的讲演,并且已经去了。梁启超事后给几个儿子写信说:“君劭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彼已屡次反对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闹到脑充血云云),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应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从梁启超的口气和事件本身来看,张君劭像儿子一样关心他的健康,梁启超说这话的目的绝非责备。仅隔不到一个星期,他对女儿再次提及此事,口吻不无炫耀之意:“神经过敏的张君劭,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现在磋商的条件……4. 每星期一、三、五之佛学听讲照常上课(此条争论甚烈,君劭现已许我)。……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劭找着了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 君劭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 问他怎样办法? 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逐我出境!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从今日起已履行君劭所定契约了。”如果我们揣摩一下梁启超说这话的口吻和心态,大概还有这么一层意思:梁启超子女不在身边,他对于门生和朋友的关照十分欣慰,并引以为荣。几天后他在给蹇季常的信中再次提到自己的病情,说自己“实无大病,君劭太相爱,故情急耳,望勿以为念”。稍后他又怕女儿着急,特别向梁思顺(令娴)解释这件事。

梁启超在逝世之前一直保持和几个儿女经常通信的习惯,和长女梁思顺通信次数尤其频繁,有时一个礼拜有两三封信。与儿女的信中他称梁思顺为“我的宝贝思顺”,称幼女梁思庄为“小宝贝庄庄”,称幼子梁思礼为“老白鼻”,称梁思忠为“忠忠”。这些都让人透过纸背看到一个和蔼老者的形象,而其时的梁启超刚到知天命之年,这种老牛舐犊的情怀恐怕只有在一个对家庭充满无限热爱的漂泊者那里才能如此深刻。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俩跟着梁启超进城去给二叔梁启勋祝贺生日。11点多的时候,两个人见大街上学生游行示威,举行国耻纪念,就同坐一辆菲律宾小汽车出门看热闹,结果在南长街口迎面被一辆大汽车撞翻。梁思

永血流满面，跑回家叫人救二哥。梁启超赶紧让人把梁思成背回家中，看到儿子身上、脸上连血色都没有，不禁心如刀割，心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残废也甘心。”后来两个孩子检查都无大碍，梁思永不过是嘴唇碰裂了一块，梁思成则只是腿部骨折。梁启超瞒着夫人给女儿去了一封信，唯恐女儿被《晨报》上登载的消息吓坏。此信可以看出他对横死(violent death)是极度恐惧的：“我现在极高兴的告诉你，我们借祖功宗德的庇荫，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梁启超嘱咐两个“淘气精”赶紧给妈妈和姐姐去信安慰，梁启超还亲自到出事地点去“踏查”，看见被撞死的人尸体还没有殓殓，一直“惊心动魄”。兄弟二人在协和医院就诊，一个腿不能动，一个嘴不能吃东西。思成就故意在思永面前大吃大嚼吧嗒嘴，思永故意在思成面前又蹦又跳，梁启超便又想起出事时的场景：思成受伤还在安慰父亲，思永受伤还在看护哥哥。他觉得儿子还是很有风格的，“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命运在他看来很有戏剧性，对于生命的观念，梁启超既相信佛教的业报，也相信人事的偶然因素。他相信现世所营造的种种“德业”也会成为后世存续的基础，他曾说，自己有10个孩子，虽然不是五子五女，但也算“功德圆满”了，“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述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时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他反思自己常常因各种俗务缠身而不能安心著述，这虽然带有自谦的意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晚年希望全身而退的愿望。1915年冬，元配李惠仙罹患乳腺癌，原本不信教的梁夫人病中突然皈依佛法，死前还让儿辈诵《法华经》，最后已经失去痛觉，所以去世时很安详。梁启超惊叹：“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但他对夫人的离世深感内疚，这种歉疚之情的产生缘由甚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小事。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梁夫人得病的原因时说：“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这一次所谓的“打架”，是指1914年他本人“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溪一度”。

这一年梁启超诸事缠身,在司法总长任内又接任币制局总裁一职,想辞又辞不掉,加上妻子马上要分娩,他很是消极,对汤觉顿自嘲说:“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这样的心态,家庭拌嘴自然难免。悔恨之余,梁启超也将彼岸世界的图景想象出来。他直抒胸臆:“呜呼!君真舍我而长逝耶?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瞬不视耶?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梁启超将这篇祭文看做自己一生中的好文章之一,还特意叮嘱儿女和儿媳“不妨熟诵”,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慎终追远的味道,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显示出自恋人格的倾向。梁启超经常将自己的诗文大批大批地寄给子女,有时报纸上发表了的文章,他也要求子女经常看看,足见他一生对做文的重视,这是他对留名于世的最好注解。他特别看重后代人对自己的评价,看重身后的名声,他希图通过“立言”而“立德”,进而达致“不朽”(immortality),这也凸现了他的自恋人格之一面。

梁启超的业报轮回思想影响到他对死亡的看法。他曾以女儿择婿的成功为自己的第一个成功,以儿子思成能够与林徽音结合为自己的“第二个成功”。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借教育孩子的机会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善恶报应观念。他说:“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像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这是借用俗教名词)。佛说是‘涅槃’(涅槃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

切实受用的所在。”梁启超的这种“现世现报”实际上也将他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各种“善变”行为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树立从一而终的形象。

不能寿终正寝对于梁启超来说是一种焦虑。1927年6月15日他给女儿的信中谈起王国维之死，说王国维虽然遗书上写的自杀动机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但最近的刺激却是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前者为人不自爱但学问很好，有“自取之道”，后者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而被杀，所以王国维对政治侮辱斯文的做法感到不可接受。王国维之死，“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此时思成还在美国留学，仆人寄信将住址写错了，包裹被退了回来，梁启超之妾王桂荃女士不明所以，便惊惶失措，开始“扶乩”问已故的李惠仙，梁启超记述说：“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我们说，梁启超是力挺科学的，但他并不因此而阻止“王姨”的“迷信”行为，也希望儿子能在国外平安无事，不会因秩序混乱而死于非命，这显然出于其内心同样的焦虑。特别是晚年患上肾炎，在协和医院手术割除右肾，但还是便血，倒是伍连德开的中药很有效，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对于协和给自己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他显然有些担心，但由于自己一直声言西医是科学，所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他希望自己能给世人一个稳定的形象，所以在总结自己和康有为的根本不同时，他指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则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想法不外乎两点，一是要为自己的“善变”正名，二是不希望因为“善变”而影响到对自己身后的评价。

梁启超对身后事看得很重，对先妻墓地选择和建造一事非常上心。在梁启超的叮嘱下，二弟梁启勋跑前跑后，一砖一石都亲自过目，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有时一夜而返，有时当天返回工地，期间还有六天夜工。基本完工时，梁启勋说，地基打得很牢固，采用两冢一圪的模式，圪外工程他敢担

保将来孩子们“要起一座大塔，也承得住了”。梁启勋并将如何开启两冢中间的砖墙并如何再造都详细训示给梁思忠，因为他怕梁启超下葬时，自己也已经驾鹤西游，“即在也怕老迈不能经营了”，还把开圻行第二次葬礼时墓图的尺寸画了出来。梁启超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孩子：“你们须留心记著，不可辜负二叔两个月来心血。”梁启勋自诩在这次墓冢设计和操作中“用他的科学智识和工人的经验合并起来”，新发明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两冢一圻，原本的方案里有“同一坟园分造两冢”的建议，但梁启超说：“此已乖同穴之义，我不愿意。”对于二弟的苦心，梁启超深解其意：“因为这也是我的千年安宅，他怕你们少不更事，弄得不好，所以他趁他精力尚壮，对于他的哥哥尽这一番心。”所以梁启超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对二叔孝敬，还让思忠、思达向二叔深鞠躬，同时要求思顺、思成姐弟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1925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下葬当天，梁启超着实悲痛了一番，但余哀未尽，思宁、思礼这些孩子们便已开始嬉笑玩耍起来，梁启超引用了唐人的一首诗表达自己此刻的真实感受：

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这场葬礼共花去“三千余金”，葬完后，梁启超又买了两块汉白玉石碑，“将来竖起还要花千把几百块。现在连买碑共用去四千五百余，存钱用光，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但梁启超并没有认为这个钱不该花，倒是自己在北戴河买的房子，觉得“很不该”，“现在弄到非常之窘”。在通常的意义上，很难见到一个人省吃俭用、卖书兼职甚至通过透支来营造天堂乐园的，若没有“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流亡者情结”，我们恐怕很难解释他晚年的诸多行为。

南桂馨与刘师培

以及刘氏著作的整理和出版

散木*

南桂馨其人

南桂馨(1884~1968年),字佩兰,山西宁武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并留学日本警察学校,返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山西军政府特使、山西巡警道大同镇守使、河东筹饷局局长、山西都督府参谋长、粮服局局长、山西警务处处长、太原警察所所长、山西防疫局局长、北方革命军司令部政治主任、山西驻京军代表、天津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立法委员、河北省政府委员、傅作义部总顾问等。

南桂馨是辛亥革命后山西的重要人物,也是赫赫有名的山西豪富和耆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响应号召,捐出煤矿资本、房产股票、有价证券等给山西人民福利事业委员会,获得好评。其时,他曾担任联合银行董事、山西省政协委员等,后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定居北京。南桂馨晚年撰写有一些回忆录,如《1930年阎锡山反蒋的一个起因》、《阎锡山在大连时期山西各派的斗争》、《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时期新军以外的各种力量》、《孙、段、张三角联盟前后阎锡山的动态》、《1927年至1928年接收京津之经过》及《1920年以前阎锡山的“经济措施”》等。

* 散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关于与刘师培的关系,南桂馨在其回忆录中多有涉及。他说:“忆昔弱冠东游,得识申叔于东京。稍后,余亦于役《民报》。鸡鸣风雨,砥砺切磋者,无间也。前清光宣之变,虽倾向不同,各行所志。特交谊依然,相期无负于生平耳。民国壬子,申叔自西川间关入晋,夫妻同馆余家。西窗话旧,情好靡殷。如是者二年,始复入京。”(《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一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回忆因忆及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以及当时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汲取“社会主义思潮”的经过,因而极有价值,不过,或许是因为南桂馨其人没有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知,这些材料在相关的研究书籍和文章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征引,遂为一憾。有鉴于此,本文在追述南桂馨与刘师培交往始末的同时,也录入南桂馨一些相关的回忆材料,以资参考。

南桂馨的回忆

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我在日本的种种”一节里,南桂馨回忆说:在与黄兴等建立联络之后,“我和张继、刘师培、章炳麟等经常往还,我的思想行动很受他们几位的鼓舞。当时《民报》并无固定经费,而刘师培全家在日,经常闹穷。记得有一次,他向《民报》社借三十元,宋教仁以无款可付,未能照办,章炳麟出而打抱不平,和宋争执得很激烈,刘揆一也很为难。经我和张继从中调处,才算了结。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可见在那时同志们一般是艰苦的”。刘师培彼时以“激烈”著称,可是他生活穷困潦倒,这为他日后的“落水”酝酿了决定性的因素。

南桂馨又回忆彼时“多数同志们都认为革命非有武力不可,因此,领导革命的人也自然必须通晓军事。决议,请日本人本庄繁、加藤二人教练我们学习军事指挥。又恐日本政府干涉,所以必在晚间,而且是轮换地点,今日在甲家,明日又到乙家。这样,我们坚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这以后,我和幸德秋水、大山(杉)荣及北辉次郎等常有往还。他们有时开会,都让我们参加。后来,警察不准他们开会,幸德秋水等就于每星期二到我们住所大谈特谈。所谈的内容,不外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学说,别的很少涉及。大山(杉)荣曾经对我说:‘本庄繁等常为你们讲军术,这在你们革命行动中当然需要。但他们是日本政府的军官,而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革命不可能怀什么好意。这一点必须认清！’在他们这几个人中，我和大山（杉）荣最接近，因而往还也较多。他常骂‘日本警察是资本家的看家犬’，而我却偏偏学的是警察，我想改行。大山（杉）劝我就：‘不可这样，将来归国革命，如果能掌握了警察权，既可掩护同志，又能联络同志。你有革命的勇气，这很好。但革命事业不可造次，必须涵养特深，考虑周至，才能有利。暴虎凭河，死而无悔，并不见得就能成功，这是要紧的。’诸如此类，我受到他的影响不少”。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曾深受日本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彼时刘师培与同盟会诸同志的纠纷，南桂馨回忆道：“在这时期，东京同盟会的人们，对革命前途有些悲观，《民报》内部也起摩擦，章炳麟、刘师培之间，意见日益加深。刘和我几个人意见接近。记得章让他的弟子钱夏（玄同）通知我们，不可参加幸德秋水他们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惟汾及苏曼殊等，则均主张参加。我本来是个穷学生，章为照顾我，使我兼任《民报》会计，但此时禁止我和刘师培往来，我就愤而去职。”

刘师培的“落水”及其山西之行

关于刘师培与阎锡山的关系，南桂馨回忆说：辛亥革命之后，阎锡山开始统治山西，但在袁世凯时代，袁世凯派金永赴山西分其权，时阎为都督，金为巡按使，“金、阎之间，矛盾日深”，且“金永知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因对阎特别戒备，并扩充警备队，以实力抗衡。自筹安会成立之后，金、阎之争益烈”，“阎对这种状态，甚为忧虑。因派我入京，秘密表达赞成帝制之意。以筹安会中的所谓六君子者，半数是我留日时候的朋友，而刘师培与阎、与我又更有深切的关系，所以我就衔命入京”。而在此之前，刘师培已有在阎府充任家庭教师的一段经历。

原来，“初时，刘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颇得信任。辛亥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刘暂留川省，由谢无量资助衣食。民国成立，刘妻何震从汉口辗转入京，生活无着，请我救助，我即请她到了太原，暂住我家，先把她荐到女子师范任教，后又转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后来，何震探知师培在川的消息，由阎及我各赠川资百元，何遂迎师培入晋，任都督府顾问。迄都府改编为将军府，编制缩小，顾问裁